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史海钩沉】	红卫兵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	王复兴
【往事非烟】	文革琐忆	周有光
【生逢乱世】	林风眠：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李响
【研究述评】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二）	蒋健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海钩沉】

红卫兵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  
——1964年底北京四中高干子弟致陆定一的信

• 王复兴 •

1964年底北京市中学的政治生态，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64年10月前后，北京市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联，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严重问题。认为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教师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他们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革干和工农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认为学校应搞教育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四、六、八中先后闹起了学潮，高干子弟领头，批判校领导，批判老师，批判语文课文，学生斗学生，此即所谓发生在1964年秋季的“468学潮”。六中、四中的学潮后来发展到“社教运动”。笔者当时是北京市四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四中的学潮主要是由高三年级的高干子弟领头闹起来的。回顾当年的历史，可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468学潮”是文革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而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高干子弟至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信，深刻反映出了文革初期中学红卫兵运动的纲领和思潮。

1964年深秋，四中闹起学潮时，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弟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四中学校领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严重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进校。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宣部，一封给北京市委。信写好后，高干子弟联合签名，有杨东胜（杨成武子）、苏承德（苏振华子）、宋克荒（宋任穷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六名高干子弟。写信日期是1964年12月20日。高干子弟自有通天渠道，一封信通过四中学生陆健健（后改名陆健，陆定一之子）递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封信通过四中学生傅洋（彭真之子）递交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陆定一收到信后，于21日转交北京市委。中宣部于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114期上刊登了此信。当年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四中社教工作队队长李晨证实了此信，李晨在《北京市中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的著作中，说：“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杨某某等6名学生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一些严

重问题。21日陆定一将此信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第114期刊登了此信。此时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被批斗。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于1964年12月28号进驻四中。”（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

此信的一个直接效果是引发了四中的社教运动。当时此信在四中学生中传得沸沸扬扬，高三学生无人不知。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人看到过此信全文。信的作者们从未公布过信的全文，且保密工作作得很好。该信虽然点了我的名，但我却蒙然不知，直到2019年6月我才看到此信的详细摘录，感到此信是一份重要史料，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年高干子弟的高贵血统意识及迫不及待地开展阶级斗争的激情。

我得到这份史料的经过是这样：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与文革史学者、现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研究员王海光先生，于2019年6月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史教授、党史与文革史学者印红标先生在长途电话中交流了有关“468学潮”和“四中社教”的历史，二人谈到四中这封信。印向王要这封信。王海光遂于2019年6月10日把此信的详细摘录的文字材料发给了印红标。印红标与笔者相熟，知道笔者在研究“468学潮”和“四中社教”，于是印先生又立即转发给了笔者。印在给笔者的微信中特别说明：王海光看过该信的全文资料，但他发的是摘录。笔者估计，这是因为该资料尚没解密，且无电子文档，只能手抄。笔者能看到详细摘录已是很难得了。对此，笔者很感谢王海光、印红标两位先生。

以下是此信的详细摘录：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同志：

一、在我校以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为首的在本校入党留校生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包括团委书记、政治教研组长、行政负责人、高二班主任等。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说了算。

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

二、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学生会主席吴铁生父母为历史反革命。军体部长王复兴祖父为官僚资本家、父亲是一级右派。同时，对李新桅（李井泉儿子）进行百般人格侮辱（李说过，“我要是执政，先杀你们这样的团员。”）。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发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学入团。对肖云（肖华儿子）志愿书填好了二年才被讨论。

三、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但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但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如对南自卫（他推了小同学一下，被停课两周。）

四、学校其他一些老师问题也很严重。如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学生干部。

党支部不让搞阶级斗争，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

我们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下来，把我校的问题彻底搞一下。

杨东胜（杨成武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为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苏承德（苏振华子）、钱乐军、李安东、宋克荒（宋任穷子）

1964年12月20日

该信的签名很有意思，六个签名人之中，有四人后面带括号，注明父亲是谁。笔者估计，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写信人的身份（血统）是一批高干子弟。如不注明，因陆定一不认识这些学生，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就不会意识到这封信的份量。

该信的作者中，杨东胜、宋扬之是笔者同班同学，宋克荒是是笔者四中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同一年级同学，这三人当年都是笔者的好朋友，至今仍是朋友。尤其是该信第一位的签名人杨东胜，我们两人都喜欢体育运动，私人关系很好。他被排在签名人的第一位，并非因为他是高干弟闹学潮的核心，而是因为他爸爸的地位，因为他爸爸是杨成武。在笔者的印象里，杨东胜本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不高，他曾私下对我说，“我爸就让我好好念书，以后建设祖国。”据苏承德、宋扬之二人于2016年4月16日在笔者采访他们时，苏、宋二人告诉笔者，当年四中学潮中，高三年级高干子弟有个核心小组，召集人是邱承光（邱会作子）。其他核心成员有：宋克荒（宋任穷之子）、肖云（肖华之子）、苏承德（苏振华之子）、刘安东（水电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澜波之子）、杨东胜（杨成武之子）、李新时（父亲是上海空四军的少将）、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等人。开会地点有时在刘安东家，有时在肖云家。

当年笔者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与纠结，反而有着个人友谊。笔者记得：1966年8月时（文革初期），杨东胜从清华骑车到北大找笔者串连，对笔者讲，他在清华“支持蒯派。”对清华运动，杨东胜与贺鹏飞（贺龙子）观点不一致，到北大告诉笔者，可见二人关系不浅。笔者对四中高干子弟写信动机的理解是：他们当时给中共中央写此信，信中还提到笔者名字，完全是出于所谓的“公心”，即他们的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按他们的说法，是出于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为着反修防修。笔者认为，他们在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血统观、出身歧视，表明他们实质要求的是红二代的特权。归根到底仍是“私心”。该信从头至尾贯穿着血统论，以血统论为是非标准，以此评判四中领导的政治立场，评判是马列还是修正。他们以这种理念，批判学校党的领导是修正主义。当时，笔者风闻有这么一封信，但不知点了我的名。我是于五十四年之后，才看到上述资料，才知我在信中被点了名。如果当年知道被点名，被告到中央，肯定“亚历山大”，将很难顶住如泰山压顶般的精神压力……他们当年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这还要感谢他们！

此信批判校领导的第一条罪状，说，“在我校以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为首的在本校入党留校生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说了算。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其意是，学校主要领导“出身均不好”，因而“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这里完全没有涉及学校的教育方针、政策、制度，只以血统确定组织路线的是非。他们以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了四中领导机构，点名批判了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

苏承德曾于2005年一次四中校友返校欢聚的大会上，在大会会场站起来发言，向当年曾受到冲击的学校领导刘铁岭、屈大同道歉（因当年高干子弟给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告状信，点名批判了副校长刘铁岭和教导主任屈大同）。苏一讲完，屈大同老师马上站起来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师生们为二人的发言热烈鼓掌。

此信批判校领导的第二条罪状说，“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干部的出身都不好。”他们以查三代的方式，举例笔者和学生会主席吴铁生。此条失实的是，当年笔者当选为学生会的军体部长（军训体育部负责人），根本不是校领导指定的，而是学生代表大会选举选出来的。我是当选的那界学生会成员中，以最高票当选。选举结果曾在校园张榜公布。我当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当年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400米、800米冠军，400米蝉连了第三届冠军。而四中的学生大多特喜欢体育，故我的四中体育粉丝多一些而已。加上团的团支部推荐信表扬笔者是“三好学生”（身体、学习、思想三好）。那封投述信举我的例子，完全失实，强词夺理，是明显的出身歧视。他们的信提到我的祖父和父亲。我的家庭信息来源，他们取自何处？他们并无权力查看同学档案。这应是当时自己“自觉革

命”，曾用了两周时间，给团支部写了十几页的“思想汇报”，批判祖父、父亲，表示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同样，吴铁生也是因为曾在全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上，作典型报告，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表示要和家庭决裂，做革命接班人。当时吴铁生被学校领导树为出身不好但政治表现好，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典型。吴铁生学习很好，曾获金质奖章。但这一当时的正面典型，也被举报信的作者们当作反面材料来使用了。正面的事例被利用来当反面材料揭发、批判用，这种手法当然不恰当，而这么作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对学生干部不服气，而是对高考入大学、入团入党、工作岗位，他们都要求有特权待遇。例如第二条罪状中，就控诉“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发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学入团。对肖云（肖华儿子）志愿书填好了二年才被讨论。”当年高考上大学，既要过政审关，也要看高考分数，有些高干子弟功课不好，照样考不上名牌大学。对此，他们也不满。他们还引用了李新桅（李井泉儿子）的话，当作正面材料引用，指出李说过，“我要是执政，先杀你们这样的团员。”表明：他们对出身黑五类的团员要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以此表明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

此信第三条，指责校领导不在学生中开展阶级斗争，不批判学生中的“反动思想”。这条意见，后来竟被四中社教工作队采纳。北京市委回应了此信提出的四中开展“社教运动”的要求，于1964年12月28日派工作队进驻了北京四中。北京市委收到该信，一周之后，彭真便派出了工作队进驻了四中，目的是控制学潮，降温刹车，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四中工作队由市委文教书记张文松领导，由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进校、具体负责。

社教一开始，工作队便矛头向下，开展了批斗反动学生的运动。工作队把高三4班毕向明定为全校重点批判对象。毕向明是笔者所在班的同学，他来自农村，祖父是富农。他重视学习，不大关心政治。全班召开了批判他的会议，工作队李同志在场坐阵。同学们批判毕走白专道路，还要他交出家里的“变天账”（指49年土改前的地契），这是学生们从流传的农村四清的故事中学来的。最后，工作队李同志做了尖锐批判毕向明的发言。

在高三4班一次批判毕向明的会上，大家“逼”毕向明交待反动思想，毕交待不出来就过不了关。再三逼迫之下，毕向明开始顺竿爬，胡说八道，他“供”道：“我曾想混进中南海，炸中南海。”“你根本进不去中南海，怎么炸？”“有的同学有进出中南海的证，我可以借证件。”毕“供”出反革命思想后，大家就“信”了。“逼供信”之后，自然是一片“打倒！”之声。会后有的同学跑去找工作队，要求枪毙毕向明。（工作队及时批评、制止了这一动态。）

当时高三其他各班都召开了批判毕向明的批判会。高三各班都进行批判的斗争对象，只有毕向明一人，他是被工作队确定的反动学生典型，成为四中四清运动的重点。运动后期，毕向明被工作队定为敌我矛盾，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让参加高考，毕业后被发配到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毕向明是在四中社教中，被工作队定下的唯一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人。文革中团河农场的人联合毕家乡的人差点把毕向明打死。文革后，毕向明找到当年工作队队长李晨要求平反，李晨说“孩子，你受苦了……”李晨为他写了平反证明，而后毕向明由四中接收，做基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四中校友返校聚会，65届高三4班聚会由毕向明操办，同学们对毕分外热情，表达了对他的歉意。当年高三4班四清运动核心组组长刘安东两次向毕明非常诚恳地道歉。毕向明嗜酒，2002年因病去世，在京的二十多名同班校友出席了追悼会。

苏承德文革后回忆工作队发动学生斗学生，认为是工作队为着平息高干子弟对校领导的愤怒情绪，转移目标，因此矛头向下斗学生。事实是四中四清工作队采纳、推行了高干子弟上书的第三条意见。

此信第四条，指控：“学校其他一些老师问题也很严重。如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学生干部。”高干子弟的权力观念很强，把学校班、团的学生干部视同基层政权。在四中的学潮中，他们仿效农村四清中“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的作法，在高三各班，进行了“夺权斗争”。

大约在1964年11月，四中高三许多班发生了“夺权”。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笔者所在的高三4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1959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生父于1949年去了台湾。）被刘安东（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刘澜波之子）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4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这经过改选程序。

同一时间，高三6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高艳华因不是革干子弟而改任班长；高三3的团支书石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他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15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与林彪、叶剑英曾有过矛盾。1950年在广州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籍、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1954年6月7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也被夺了团支书的权，可见当年高干子弟们受父辈权力斗争影响之深，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已相当政治化。陈光于1988年4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纪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2016年4月16日，在北京，笔者与四中同班好友于火，约会了三个高干子弟四中校友：苏承德、任小彬、宋扬之，进行采访。苏是当年四中学潮的核心小组成员，任、宋是较大范围核心圈的成员。三人于四清结束、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深造、培养。聚会时，大家应笔者之邀，回忆、反思了当年北京四中的学潮与社教。苏承德等三人详细回忆、讲述了当年的许多内幕。

苏承德在我们五位校友聚会时说：“当时推动我们高干子弟搞运动，搞社教，主要有几种思想：一是阶级斗争观，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二是接班人观，当时片面理解了中央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指示，认为革命后代首先要负起接班的责任，当革命接班人；三是反修防修观，既要反苏修，也要反中国的修正主义，首先要破除学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这么几种思想的推动下，出于责任感和优越感，觉得革军、革干子弟有革命责任要搞阶级斗争；认为自己出身革命家庭，是当然的接班人，干革命，舍我其谁？”

苏承德说：“反思当年的事，在四中的学潮和后来的社教中，四中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就是后来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先行者和预演。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后来发展成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四中高干子弟打破班级界线的小组织活动则正是后来红卫兵组织的雏形。开展阶级斗争，批判领导、老师，学生斗学生，抄家，后来红卫兵干的事，那时在四中已经露头，开始出现了。”

苏承德的反思告诉人们：文革的起因源于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预演。

四中高干子弟1964年底致陆定一的信，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当年高干子弟以血统划分阶级并开展阶级斗争的思潮。

□ 王复兴 2020年9月1日于美国德州奥斯丁寓中

~~~~~  
【往事非烟】

文革琐忆

• 周有光 •

一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农业生产逐步有些恢复，城市生活的紧张情况也得到了缓解。但是好比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时，是没有精神的，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60年代就感觉到一种迷茫的情绪，要不要做事情，能不能做事情？有的事情想要做也不敢做，怕越做越多错误。大家讲话也非常谨慎，不谈国事，更不谈世界。想不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动乱——一场人为创造的、自上而下指导的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我们这些在政府机构（文字改革委员会——编注）工作的人员，每天奉命准时上班，上班就学习政治文件。有一天，学习空气特别严肃，学习什么呢？学习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篇社论中大骂两种人：一种是教授，一种是工程师。第二天，继续学习社论，也是如此，继续骂教授，骂工程师。这是要干什么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到第三天，这个社论的口气就转变了，不再骂教授，不再骂工程师了。骂什么呢？骂“反动学术权威”。隔了若干天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说，由于《人民日报》反对、大骂、攻击教授和工程师，引起国际上的强烈的不安和反对。所以第三天的社论口气就改掉了，改为“反动学术权威”——实际指的还是教授和工程师。既然“学术权威”是“反动”的，那中国政府加以反对，国际社会就不好批评了。后来，这个反对的对象改变了，重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了，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当时，坏人被清楚地归纳成“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这个时候呢，“黑五类”的构成有所改变，因为地主都被打倒了，“走资派”就变成第一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头一两年，我还是继续准时上班、学习，但不做任何业务工作。下午很早就下班回家休息了，没有事情好做，只感觉到惶惶如也。大概到第三年，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开始设置“牛棚”。这个牛棚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我们单位有三间大屋子，原来是汽车库房，就把这三间汽车库房收拾一下，放了很多张床，就成了“牛棚”，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多种坏分子，都关押在这个地方，不许他们住在家里。住在里面，每天学习，每天劳动。我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所以也搬进去了。在我们单位，我们单位的领导吴玉章、胡愈之没有被关到这里面。第三位是秘书长叶籁士，是“走资派”就被关在这里面了。“反动学术权威”呢，包括倪海曙、林汉达和我三个人。此外，我们单位当时七十多个人，其中被划为“黑帮”的有二十几个，这些人全部被关在这个“牛棚”里。

“牛棚”的生活大概是这样，上午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组发下来，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语录，是油印的，字很大——有点像四号字这样子。大本的，有好多本，不是一本两本。主要是自学，自己看，不许做笔记，也不能带回家，看完之

后要上交。学这个《毛主席语录》，倒的确使我开了眼界了，让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讲话。

除了学习，还得劳动。劳动就是去扫地、拔草、搬垃圾，诸如此类的劳动，不算很重。每天吃饭都得排队，无论早饭、中饭，还是晚饭。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所以要让其他人排在前面，让他们先打饭。住在“牛棚”里，起初管理比较松，每个礼拜六可以回家住，礼拜天上午再回到“牛棚”。但是回家是有任务的，什么任务呢？继续“破四旧”。

##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破四旧”作为一个重点工作。那时我住在沙滩后街，这里住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文改会的人没有什么增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相关的人，越来越多。“破四旧”的时候是雷厉风行的，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而且不断听大报告。报告中表扬有些“破四旧”做得好的，就是把家里面的旧的东西都清除掉。所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关的东西，包括从前的文凭、证件、大学聘书、照片，都要烧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的家具也拿来砸掉。不许留外币、白银、黄金，等等。旧的线装书也是“四旧”。我以前把很多书放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是“黑帮”，就不能去办公了，办公室就不能再放东西。于是我们的书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价格还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些“黑帮”的工资就减少下来，起初大概是减掉一半，后来越减越少，最后减到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这35块钱还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种费用——具体我记不清楚，反正是没有钱吃饭了。我奉命“破四旧”，把从前的文凭、奖状、奖章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一样都毁掉。有很大的炉子，把这些旧书烧掉。我的太太张允和，她是搞历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卖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人到我们大院里一家一家地收旧书，一部《二十四史》卖了多少钱呢？卖14块人民币。收旧书的人已经很客气了，否则要论斤称，大概只能给7块钱也卖不上。

当时旧书店的人可以随便跑到你家里来，随意看你的旧东西，“破四旧”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就说：“你这个也是‘四旧’呵。”我说：“好，这是‘四旧’。”我笑笑。这个旧书店的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说：“你这个书呵，倒有人要，我给你联系一下，假如能够卖掉呢，你还可以拿几个钱，否则‘破四旧’都烧掉了或丢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说好。不久呢，他告诉我，有一所学校或是图书馆，要这个书，而且给的钱并不少，500元人民币。当时500元是一个大数目，而我们那个时候正好缺少钱用。我说好，就卖给他们了。500元人民币，这是“破四旧”能卖掉的东西中价格最高的了。

张允和喜欢昆曲，她拍了很多昆曲照片。同时我们家里还存有很多老照片，虽然数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比如我很小时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张允和小时候的照片、张允和父母的照片。这些我们不舍得“破”。不舍得“破”不行，形势越来越紧张，已经有人因“破四旧”不彻底，而变成斗争对象了。被斗争之后，那“破”起来是更厉害了。

“破四旧”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点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里除了我的书，还有朋友的书。朋友的书怎么办呢？我随便把它“破”掉了，将来没有办法还人家。其中有一部书，是林汉达借给我的，《世界美术全集》，都是世界名画的图片，这部书是很名贵的。我想这部书若被我搞掉了，我对不住他，我还是先还给他。一打听呢，他们家因为孤零零住在他自己买的房子里，暂时还没有事——我们家那一带“破四旧”闹得很厉

害。于是我就在晚上想办法偷偷带了这部书去还他。我还书回来，觉得心里踏实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们家。林汉达是我们单位的，可是他的儿子或是什么人是另外一个单位的，而这个单位好像跟一个家具厂有关系，大概是这个工厂里的人来“破四旧”。所以说，当时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会跑到你家里来帮你“破”。这些人到他家里“破四旧”，一翻翻到这一部书，哈，这还了得，把“黄色书籍”藏在家里！他们就把这部书带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两天，由于隐藏“黄色书籍”，那个单位把他抓去开斗争会。这样，我就很后悔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到我家里来“破四旧”时，他们搜查的都是中文书，看到外文书，一概不动。所以我家里的外文书一本都没有动，有许多洋文书我还保留了下来。而他因为这本书却吃了苦头。据说，拉他去斗争的时候，让他向群众下跪，跪着交代。

我们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旧”的。比如沈从文家，他的书是特别多，就被搞光了。书搞光后，就把沈从文一家集中在他们以前存书的一间小房间里，一家人住在原来的小书房里。

还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名字叫敏宣。这个袁敏宣昆曲唱得非常好，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她进过大学，会英文、德文，昆曲唱得特别好，会画画、会写字，真是一个女才子。以前的惯例，有才能的女子结婚之后是不工作的。她跟张允和都在昆曲研习社，是好朋友，好搭档。她的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钱。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的邻居有一个小学校长，不多几天就自杀了。这是他们胡同里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到我们家来，问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个人要自杀？因为报上这些文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对她毫无影响。

这个时候全国都停下来不做工作，除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及极少数地方之外，其他学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统统停下来不做工作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国停下来不做工作，这是前无古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即使想读书无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虽然时间还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北京图书馆——当时在北海旁边，这个时候借书就有困难了。我们家在沙滩，跟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边借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里借书就紧张了，有限制。只能借你专业的书，别的专业的书不能借。比如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只能借语言学的书。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 Merchant of Venice。这本书是用英国的所谓“基本英语”写的，“基本英语”里就没有“Merchant”这个词，就用“Trader”这个词代替

“Merchant”。我要借这本书，图书馆说不能借，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的。我只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借这本书呢。我说，这本书是用基本英语写的，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想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我告诉他，基本英语里没有“Merchant”这个字，所以改用了“Trader”，这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学书，它是跟语言学有关系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讲了半天，他总算给我面子，借给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想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很大的限制了。

后来我就明白了，从“反右”开始，是一步一步压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这样子：不许你随便做研究工作；不许你写文章；不许你藏书——不许你藏外国的书，也不许你藏古代的书。诸如此类都是限制。“破四旧”当中，特别在我们这种单位里，主要是破知识的“四旧”，毁掉你的书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办公了，研究也不能做了，而且情绪也很不安定，每天都好像是在大风大浪中。因此我空闲下来，同张允和去看看袁二姐。

袁二姐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她聊天是非常有趣。在她家里聊天时，胡仙洲不太参与我们的谈话。每天六点钟吃了晚饭——我们吃晚饭都很早——之后，我们就到景山公园去散步，胡仙洲也去散步，所以我们就成了散步的朋友了。散步的时候还碰到另外一个朋友，这个人是一个工程师，曾在欧洲读书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衣服穿得非常土，一身土样子，生活习惯也很土，显得非常有趣。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会。他不坐椅子，而蹲在地上——不是坐在地上，是蹲下来，拿一条腿蜷着，另一条腿站着，这有点像公园里的仙鹤。仙鹤休息的时候，把一条腿弯起来，藏到羽毛里，只用一条腿站着。后来我注意到，北京乡下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休息的：不坐地上，因为地上很脏；也不坐凳子，从小家里不一定有凳子。你怎么也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在这个无心做事、无事可做的短暂时期，每天跟胡仙洲以及这一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在一起，在景山公园散步休息，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胡仙洲也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的知识非常广博。他看的主要都是德文书，每次他读到一些趣闻，就讲给我们听。比如，印度尼西亚蛇很多，有种蛇喜欢吃猪，一只小猪蛇一口就吞进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农民就把一只小猪放在木棍做的笼子里，蛇进去之后，把小猪吞到肚子里，蛇的肚子就变得非常大。蛇头可以从这个笼子里钻出来了，但肚子却钻不出来，怎样扭动不行，也缩不回去。于是主人第二天就能将这条蛇抓到，将小猪从蛇肚子里剖出来——当然死掉了，但是照样可以吃。这是一种捉蛇的方法。后来方法更进步了。农民知道蛇喜欢吃鸡蛋，就做了许多木头的“鸡蛋”——将打碎的鸡蛋涂在木头上，放在笼子里。蛇进去了就吃鸡蛋，贪心不足拼命吃，它的肚子就涨大了，跑不出来了。而且蛇吞了这些“鸡蛋”在肚子里，就想把它绞碎，但木头鸡蛋怎么绞绞不碎，结果蛇就胀死了。用这个方法捉蛇更方便。

印尼这个地方，鳄鱼很多，而且鳄鱼吃小孩、吃狗、吃鸡。鳄鱼有个奇怪的习惯，它在哪儿上岸呢，也从哪儿下水。它经过的地方痕迹是很清楚的。于是，农民就等这个鳄鱼上岸，在它要经过的地方插上锋利的小刀。鳄鱼上岸偷吃了鸡之后，回去还从原来这条路上走，结果肚子就被划开了，还没有到水边呢，鳄鱼就死了。当地人用这种方法来捉鳄鱼。

每天傍晚，我们在景山公园谈得非常开心，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外面文化大革命是闹得越来越厉害，我们不谈，我们谈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是好景不长，造反派越闹越厉害了。造反派就到胡仙洲、袁二姐家去造反了。这个造反的具体情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听到他们家发生了大问题，不敢再去看他们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形势也紧张起来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造反派到他们家，把所有东西，能打烂的打烂，值钱的都拿走。造反派怀疑他们地板下藏了好东西，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很讲究。袁二姐的父亲是在清朝做大官的，叫袁励准。袁励准题写的匾额，今天在颐和园的听鹂馆中还可以看到。袁励准做过宣统皇帝的老师，常州人，是我的老乡，可能还有点远亲关系。袁二姐是生长在北京的，北京话自然讲得非常好。他们家被抄得非常厉害，地板都被掘开了，房子被砸得一塌糊涂。搞完以后呢，他们家有一个小房间，本来是放柴火的，造反派就让他们一家人住在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留给造反派住。

不仅如此，还把胡仙洲抓走了。不到一个礼拜，通知他们家说，人死掉了。后来才知道大概情况。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家的時候不敢吃米饭、馒头，只能吃窝窝头、玉米粥。同

时他自己准备了药，必要时可以自己治疗病情。他被抓走之后，造反派斗争他，把他关在一个茅房里。糖尿病发作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再加上被打得很厉害，很快他就死掉了。他虽然有糖尿病，但原来身体还是很正常的，真是悲惨。这件事情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给他平反。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袁二姐住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我们去看她。她还是那么乐观，依旧谈笑风生，非常有趣，而且她讲的笑话，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后来，她生病无人照顾，就死了。她的年龄比张允和还小，比我小更多了。她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女才子，她的死很可惜。

谈到袁二姐，我们就一定会想起袁二姐的一个侄女儿。袁二姐跟她的一个弟弟住一起，他们的房子很大，有好多进，袁二姐是住在其中最好的一进。她的弟弟和弟媳，还有两三个女儿，住在前面一进。这几个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有的读小学，有的读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教育告诉她们，她们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太坏了，说一定要改变成分。怎么改变成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农村去劳动。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第三个女儿，当时是初中生，下农村之后，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农民。她当时很高兴，以为嫁给农民之后身份就改了，就是国家的主人了，就不是反动阶级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漂亮的姑娘嫁了之后，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是城里的闺阁千金，父亲是在大学里教书的；而另一个是农民，没有文化的，家庭很穷。这就发生矛盾了，我们不断听到这个矛盾和不幸。后来究竟什么样子，是否离婚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非常不愉快。像这样的事情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

跟这个小姑娘境遇相同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朋友”，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叫许潜庵（许实贞）。许潜庵的孙女儿，也是这个年龄，大概刚刚进初中的样子。她不是自愿下农村的，是被迫下农村。她去的农村更远了，下到东北，大概是黑龙江。许潜庵在这个孙女儿去的时候，就关照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乡下结婚，终身不嫁也可以。这个孙女儿就听了这句话，怎么样也不结婚。后来打倒“四人帮”之后，政策改变了，她也被放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好。这两个人是两种结果。当时许潜庵这位老先生，叫他孙女儿一定要回来，不能嫁给农民，这个话在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言论”，假如被造反派知道了是不得了的。

#### 四

这时，红卫兵的风潮闹得越来越大。我们单位很快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单位一定要自己组织红卫兵，才能够防止外面的红卫兵、假红卫兵、非红卫兵到本单位来抄家。来抄家的，许多都是抢砸东西。自己组织红卫兵，自己造反，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本单位的“黑帮”人物。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大字报越贴越多。起初在礼堂里贴，后来贴到礼堂、大院外面的墙上。那么大的北京大学旧址，大院子里整个都贴满了，就贴到大门外面去。不仅我们一个单位，所有单位都是这样，都是在本单位的墙贴满之后，再贴到马路上去。以我们单位来讲呢，往西往北，一直贴到动物园。比动物园更远的地方有没有贴，我不知道。这个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骂人，骂“走资派”，骂“反动学术权威”，骂“地富反坏右”。我是我们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当然是批判对象。每一幅大字报上都有我们的名字，用黑墨水写的，上面用红墨水打一个叉叉，说明这是反动人物，有的时候把你的姓名颠倒起来写。

这时候，我被关在“牛棚”里。我的爱人也不敢住在家里，因为是反动分子家庭，谁都可以来打击你，来打你的门，把你的门窗弄破，把你窗外的种的东西一概搞烂。这还不算，有时还半夜里冲到你家里来打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不敢住在家里了。我的儿子和儿媳在中国科学院，住在中关村。我们这边搞得很热闹的时候，他们那边比较冷清。我的爱人就到儿子、儿媳那里去住一阵。我的孙女儿刚刚上小学不久，我的爱人就陪她去动物园去玩，因为中关村到动物园不是太远。她们到动物园，一看也有大字报，贴满了。当中有我们单位的大字报，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叉。孙女儿认识我的名字，她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啊？”奶奶说：“是啊。”又问：“爷爷是好人，怎么被打了一个红叉叉呢？”我的爱人告诉她：“爷爷喜欢讲外国人好，所以犯了错误了。”那我的孙女儿说：“奶奶，你回去跟爷爷讲，不要再讲外国人好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牛棚里得到命令，要出牛棚，去看大字报。那时候是刚刚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就要走，有人领了我们去看大字报。我们的“牛棚”离办公楼的院子很近。这个办公楼有六层，我们自己用一层到三层，四层五层——主要是四层，是给“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的，那是外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那个时候陈毅副总理是兼外交部部长，所以这个机构批判的“走资派”，第一号就是陈毅。我们一走出这个牛棚，才知道批判陈毅的大字报多得不得了。墙上贴不下，就拿绳子挂在院子里，挂了一条一条，两条绳子之间不过两尺宽。这个绳子挂得比人高，大字报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字报的森林。你在里面看大字报都看不见人，都被大字报遮住了，你要找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噢，这些大字报全是批判陈毅的，说陈毅“反动之极”，是个老“右派”。

看完大字报，我们又回到“牛棚”里，洗洗脸，休息一会儿。我们大家就想，陈毅怎么是“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呢？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陈毅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挺好的。不过我想起一件事，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陈毅在全国政协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反右”期间如果有人受了委屈，可以对他讲，他可以打抱不平。我想起这个话，可能就是严重的“右派”言论。后来很多“右派”受了很大的委屈，也没有地方去申诉，更无法告诉陈毅。陈毅自己也保不住了，所以陈毅讲的也是空话。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都上床睡觉。但是刚才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们还一直想陈毅的问题。这时就听到很多人在一起喊口号，起初听不清楚，后来越听越清楚了：“打倒陈毅！打倒陈毅！打倒陈毅！”这个“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只是外交部的一个部门，其他还有许多外交机构，想来都是一样反对陈毅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些反陈毅的大字报，只能在大门里挂，不许挂到大门外面去，因为害怕被外国人拍照。

## 五

第二天清早，我们照例出去劳动。此时这个劳动越来越繁重，铁做的小推车，实在是不容易推。空车都很重，都不好推，放了许多东西推起来更累。在我们单位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个同事叫陈越，出生在越南，是越南华侨的后裔。他爱国，向往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偷偷地离开越南，来到北京。他写信给胡愈之，要求安排工作，胡愈之就把他安置在文改会。可是进入文改会之后，他一直受到压制，每一次运动，他都受到冲击。我们想不明白，他一直不在国内，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跟我特别好，因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一同研究。这个人非常好，跟我们一同劳动，我推不动铁推车的时候，他就帮我忙。许多重劳动他都帮我忙，两个人抬东西时，他就抬重头。他比我当然年纪轻，大概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我非常感谢他。

这个人在文改会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汉字简化方案，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这个《简化字总表》是陈越做的具体工作。比如讲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简化字总表》，起初叫《简化汉字总表》。陈越就提出，把“汉字”中的“汉”字省掉，就叫《简化字总表》。这样简单明了，大家觉得他的意见很好。还有，简化字当中，后来增加了几个字，像“英尺”的“呎”字被废除，以后就用“英尺”两个字；“海涅”的“涅”字被废除，就叫“海里”。有二十来个字，主要是从日本来的。有的一个字读好几个音，就改成一个字读个音。一批科技用字、度量衡用字的简化，都是陈越提出来简化的。他还研究用拼音字母来搞速记，出了一本书叫《简易速记》，搞得很好，很受欢迎。

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他给五个孩子取的名字含有“红色”的意思，这是倾向共产党的意思。很有趣，一个叫陈红，一个叫陈赫，一个叫陈紫，一个叫陈丹，一个叫陈绯，五个全是红颜色。所以人家说，他的家庭是红色家庭，可见他的思想的确是倾向共产党的。可是他申请加入党，一直没有被批准。为什么他要受到种种限制呢？我不明白。我们起初只知道他是被限制使用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为那些被冤枉的人平反时，才知道有一个平反小组，宣布哪些人是被冤枉的。给有些人平反，程序其实简单，比如给我平反，什么程序都没有，就是说对我的那些批判都是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有定你什么罪名，那些大字报骂的话，都是群众写的，也不算什么罪名。所以这个平反的过程非常简单，一句话就完了。而对陈越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陈越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他到了北京之后经常跟这个朋友通信。这个朋友住在香港的一个公寓里，楼上楼下有国民党的特务。他跟这个朋友通信，有人自然就怀疑陈越跟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由于这个嫌疑，陈越就一直被限制使用。文化大革命之后，上面调查清楚了，他那个朋友虽然跟国民党特务是住在同一个公寓大楼，但是那个人跟国民党特务没有关系。所以陈越受到的冤枉就平反了，平反以后，他当然很高兴。可是陈越很不幸，过了不久，他就生病了，他的病是突如其来，据说是脑袋的后面某个部位有毛病了。那个时候脑袋开刀的技术不像今天这样进步，医院给他开刀，之后就合不拢了，结果很快就死了。他年纪很轻，热心、真诚、能干，我们很为他可惜。

很快，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天天让我们写交代，写得不好得重写，开批判会，一个一个地开批判会。比如说，批判叶籁士。叶籁士是我们单位第一号“走资派”，所以罪名最重。批判某个人时，

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要去旁听，坐在第一排，听别人批判。批判的时候问他问题，答的不对就打。叶籁士被打得很厉害，有一次被打得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多月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后来才恢复。这个时候不许回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敢问别人借。他偷偷地告诉我，他没有钱了。我口袋里还有钱，就赶快拿了五块钱给他。那个时候五块钱是一个大数目，大家穷得两毛钱都不常有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如果被知道了，他要受罚，我也要受罚。我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怎么能把钱偷偷借给一个反动的“走资派”呢？这可是大罪名。

还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叫赵平生。这个人青年时代就参加共产党，研究哲学。青年时候写哲学短论文，写得好极了。在抗日战争时候，因被怀疑是共产党，他被日本人抓了去，受到拷打，人就受伤了，不能写文章了。这个人非常好，办事情很负责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办公楼每一层都弄一个很大的像屏风一样的东西，放在楼梯口，上面挂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大家上楼的时候看到毛主席像，要行注目礼、行立正礼。赵平生这个人向来不随便讲话的，可是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很像是教堂里挂耶稣像。噢，不得了，这句话被人听见了，被报告到造反派的头头那里。于是就开特别会议斗争他、打他……起初只是“走资派”挨打，“反动学术权威”只要交代问题，不会挨打的。有一次开会斗争这个郑之东，还是什么人，倪海曙跟这个人有些关系，就被要求一起陪斗。陪斗，照理不声

不响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在那里站两个钟头就下来了。这次陪斗的时候，造反派就问了倪海曙一些问题，倪海曙这个人脾气很大，他很生气。他头上戴了一项法国式的帽子——这本来已经是不合常规了，他就把这顶帽子往地上一甩，讲话很不客气。结果就激起了造反派群众的愤怒，他们涌到台上去打倪海曙，把他打倒在地上。这一下，就开了打“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人的先例。打完了倪海曙，就叫另一个被认为是“坏分子”的人上去，问也不问就打。再叫一个人上去，又打，一个一个地叫上去，都打。最后叫到我，我上去，就准备让他们打了。这时这个造反派头头就说：“好，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滚回去！”于是我们就滚回去了。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打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有一天在劳动的地方，休息期间，我遇到一个造反派的人。这个造反派是真正工人出身的，他跟我说，我们是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处理，所以没有打你，你自己以后要当心啊。后来又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告诉我，他说你是外国回来的，我们最怀疑你的就是里通外国，可是我们仔细查了，你回国以后没有给外国写过信，所以我们不定你为里通外国。

正在这个斗争越来越猛烈、几乎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忽然来了命令，由军队接管。不单是我们一个单位，许多单位都由军队接管。接管以后，开会斗争等都由军管的解放军来主持，不由造反派来主持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位军人，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文质彬彬的，很讲道理。他来之后第一次开会，训斥我们一顿之后，就宣布我们可以回家去睡觉，不要住在“牛棚”里了——当然，白天还得到“牛棚”里来学习、交代。于是大家都回家了，很高兴，这个形势算是有了一个转折点了。

可是突然又有问题了。一天开会，说我没有交代清楚，还有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那么我就想，有什么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到。每天我就是拼命想怎么交代，交代之后，他们还是说不对，于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张允和商量，我说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说，你呀，好好地想，你对别人讲过什么错话没有？噢，我想起来了。这天白天，一个造反派已经提醒我了，说我隐瞒情况，要我好好想想跟人家讲了什么话。我恍然大悟，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说“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讲“秦皇汉武毛泽东”，两个人一人一句正好凑成了一个对子。我想，这个事情以前没有想起来，说不定就是他们要我交代的。于是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到“牛棚”里去准备开会。他们说不要开会，让我写书面交代就行了。我就交了这个事情。交代以后，他们说好，就是要你交代这件事，因为倪海曙已经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么不交代“秦皇汉武毛泽东”呢？你们两个人是讲反革命语言，要定你们两个人“现行反革命”。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就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后来有造反派告诉我，这个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这个交代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军管的头头宣布，开公开的检讨会，有罪名的人，一个个上台检讨。于是就挨个检讨，有时候一天检讨两个，有的时候三四个。最后是我讲。我从出身、接受资本主义教育，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讲到文化大革命。坏的思想、坏的行动、坏的社会关系、坏的历史，等等，我都讲。讲完了，问群众还有意见吗？群众说“不满意，不满意”。这位军管的解放军说，群众对你还不满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检讨。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计还得开一次检讨会吧。结果呢，居然不开了。

□ 摘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 / 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

【生逢乱世】

林风眠：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 李 响 •

◇ 怕连累他人亲手毁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林风眠20多年的挚交傅雷夫妇在家中双双自尽。得到消息后，林风眠不敢相信，派学生去傅家证实。林风眠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他决定毁掉自己几十年来所有的画，以绝后患。

这是中国美术史上多么讽刺而残酷的一幕：画家关紧门窗，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了办法，把画撕碎，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据义女冯叶回忆，林风眠的脸坚毅决绝，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地：“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 拒不“认罪”监狱惨遭酷刑

画还没毁完，抄家的红卫兵就到了，橱柜都被贴上封条，林风眠和上海其他知名画家都被送到上海美术馆进行政治学习，接受审查。1968年，刚刚从美术馆放回家住了几天的林风眠被公安人员带走。直到预审，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特务”。其实，林风眠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而是他的一个学生是当时的某部副部长，解放前被追捕，曾经在他家呆过3天。文革时，说这个人是变节分子，就让林风眠交待问题，他于是就被关起来了。

由于拒不承认“罪行”，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手腕肿得厉害，手铐都嵌进了肉里。吃饭时也不给解铐，他把嘴凑到饭盆边吃以求生存。他的许多朋友都自杀了。他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 是当年他力保的叛逆学生赵无极救了他

1972年底，在周恩来干预下，林风眠被释放，他不敢再画画，带着一身伤病，艰难生活。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有外宾要接见他。匆匆赶去，外宾竟是三十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当年赵无极就读杭州艺专，生性叛逆，特别不喜欢必修的国画课，从教室窗子跳出去逃课。在国画期终考试的试卷上，他涂了一个大墨团，落款“赵无极画石”，惹得国画教授潘天寿大发雷霆判他零分，他险些被强迫退学。

林风眠爱惜赵无极的天赋，坚决把他保了下来，在他毕业后还让他留校当助教。后来赵无极赴法国留学并定居，竟然成了“外宾”。众目睽睽之下，赵无极疾步奔到恩师面前，长跪不起，林风眠老泪纵横，俯下身来，师生抱头痛哭。事后，林风眠对人说，这是赵无极要救他呢，“外宾”如此重视他，造反派也不敢再把他怎么样。

◇ 他凭记忆想画出文革被毁掉的那些画

“文革”结束后，林风眠在叶剑英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他被允许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四次，飞行40多个小时，到巴西看望分别22年的妻子女儿。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赠予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

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晚年林风眠客居香港，深居简出，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他一生颠沛流离，没有时间整理画册，更谈不上出版全集，以至今天市场上林风眠画作赝品不计其数。林风眠虽与徐悲鸿、刘海粟齐名，他的作品却因真伪难辨价格远远落后。

#### ◇ 黄永玉眼中的林风眠

1991年7月，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的林风眠，应傅聪之约，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是他对老朋友最后的交代，也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这样写到林风眠的去世：

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 来源：《文史参考》

~~~~~

#### 【研究述评】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二）  
——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 蒋 健 •

（上接 z k 2 0 0 9 c）

#### （四）来自境外的史料

从1993年5月开始，两位西方的年轻记者，Peter Hannam（彼得·汉纳姆）和 Susan V. Lawrence（苏珊·劳伦斯），用了半年的时间，在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等地进行调查、采访，并于1994年1月31日在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Solving a Chinese Puzzle》（《揭开一个中国之谜》）。

笔者认为，这篇报道的最大意义在于西方记者通过独立调查证实了中国官方关于林彪、叶群死在蒙古的说法。不过，笔者还认为王海光对该报道“与当年中方空军专家组根据驻蒙大使馆提供的现场照片进行技术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78〕的评论大谬不然，因为报道中提到的苏联克格勃官员并不认同中方关于飞机燃油即将耗尽才不得不迫降的说法，而且有多位目击者声称林彪的座机在空中已经着火。

需要一提的是，汉纳姆还以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为名将其调查报告发表在1994年2月2日出版的《Asia Week》上，以《林彪秘辛大公开》为

名发表在1994年2月6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79〕内中解释了叶群的手袋中有避孕药的原因：或许怕怀上与她有染的黄永胜的孩子。

1994年5月21日，中国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证实汉纳姆和劳伦斯的报道所言非虚。

1994年6月8日，与汉纳姆相熟的中国记者李安定发表长篇报道《一个西方记者采访林彪之死真相的旅行》，详细介绍了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以及汉纳姆的一个观点——“历史和新闻一样，不能埋在故纸堆里闭门造车，而必须走上前线。”〔80〕在这篇报道中，汉纳姆首次提到，他在采访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斯金时，曾询问林彪座机上有没有黑盒子，扎格沃斯金回答，黑盒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笔者认为，正是李安定的这篇报道开始让中国人普遍相信林彪的三叉戟座机装有黑盒子。〔81〕

1997年10月16日，林彪专机坠机现场的目击者拉哈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她看到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飞机坠毁后，现场大火连天，机上9人全部死了。〔82〕

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以《蒙古原高级官员首次披露林彪坠机详情》为题报道了原蒙古副外长云登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关于林彪坠机一事的谈话，云登是当年蒙方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他透露了林彪专机进入蒙古后苏、蒙方动作细节，同时也有一些明显不实的猜测。

#### （五）林彪警卫大队长的回忆

8341部队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大队长姜作寿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第一个接到林立衡报告的人，他在《卫队长记忆中的九·一三前夜》一文中回忆了林立衡的报告内容以及他、张宏、张耀祠的相关处理，以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汪东兴对北戴河警卫部队应对突发事件表现的评价。〔83〕

姜作寿说，张耀祠曾经指示张宏去向林彪本人直接汇报林立衡报告的内容，但他劝阻了张宏不要去向林彪汇报。

笔者认为，张耀祠的这个指示显然是周恩来授意的，姜作寿的劝阻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就是警卫中队长肖奇明居然在拦挡林彪座车未遂的情况下朝林彪座车开了两枪，而且汪东兴事后还指示不要追查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姜作寿这个回忆明确说李文甫（普）是被“林彪一伙开枪打伤”，但他后来在接受舒云采访时，以及他后来由舒云整理的口述回忆中，改口说李文普是“自伤”。

另外，姜作寿的回忆搞错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林彪、叶群到北戴河的时间以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立衡回北京的时间。

#### （六）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年谱和传记里的“林彪事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84〕主要收集了毛泽东1969年1月到1976年7月的批语类文字，有许多涉及林彪事件，比如，1970年10月中旬对吴法宪、叶



群检讨的批语和批注，1971年4月11日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还收集了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毛泽东1971年8—9月南巡期间的谈话纪要。

《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的编辑和出版都由中共党史权威部门完成和把关，因此它们提供的史料的可信度应该比国内一般出版物要高。

《周恩来传》大量引用了前面提到的汪东兴、李德生、吴德的回忆，还在多处引用了作者于1983年11月18—25日对吴法宪访谈的内容。（85）显而易见，书中有些说法没有确凿证据，比如，林立果曾把他的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方案报告给林彪和叶群，（86）但它起码有出处——汪东兴的回忆。（87）不过，《周恩来年谱》上“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88）这段记载以及《周恩来传》上“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却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做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其子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于是，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段内容就没有提供出处，因此广受诟病，比如，丁凯文就评论它“活脱脱就是个小说家言，编造得如此离奇、荒诞不经。”（89）但据笔者目力所及，这段内容最早由靳大鹰在1980年“编造”，（90）后来邵一海、张聿温也有类似的表述，（91）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原始素材应该来自毛泽东时代某位核心涉事人的揭发材料，至于具体是谁，笔者认为应该从《周恩来传》上林彪“警告其子林立果等”这句话中的“等”去找，看看谁能在林彪面前可与林立果一起称“等”。

当然，也不必迷信年谱、传记，比如，五一节之夜林彪“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92）的说法表明编纂人员连当年的新闻纪录片都没有看过，再比如，“七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回北戴河”的说法表明编纂人员根本没有看过山海关机场的有关记录，以及李文普等人的有关交代。

#### （七）周恩来身边人员的回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写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涉及林彪事件的内容（93）值得研究者一读，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周恩来的活动。

吴庆彤在林彪事件期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厅）副主任，实际负责全面工作。虽然他的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林彪事件的很多说法与《周恩来年谱》雷同，但提到“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那个叶、周通话时，则明确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

（94）在后来的两个增、修版回忆录中，吴庆彤维持了该电话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说法。（95）

高振普是周恩来的卫士，“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几天，他始终和周恩来在一起。他在《“九·一三”事件50小时内的周恩来》《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提道：“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那个叶、周通话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不同于姜作寿、张耀祠关于林彪座车先停车、肖奇明后开枪的说法，高振普说肖奇明先开枪、林彪座车后停车，而且事后周恩来批评了肖奇明开枪的行为。（96）不过，同姜作寿、张耀祠一样，高振普也没有说肖奇明开枪的事情是何时被报告给中央的。

笔者认为，高振普回忆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周恩来在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前就去向毛泽东报告了，而汪东兴、张耀祠都回忆说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强行起飞后才去向毛泽东报告的。高振普后来对其相关回忆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但周恩来在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前就去向毛泽东报告的说法始终没变。（97）

另外，发现和分析同一个作者、不同版本的相关回忆中的差异，并读读再版后记，对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是大为有益的。

#### （八）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回忆

毛泽东的生活管家吴连登在《我为毛泽东管家》中，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毛泽东的理发员周福明在《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毛泽东的警卫中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中，提到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九·一三”事件。（98）这四人的回忆中都有“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99）周恩来面见毛泽东的情节。

笔者认为，分析一下这四人对周恩来见毛泽东时的时间、场景和人物描述的异同，再联系汪东兴、张耀祠和高振普的有关回忆，有助于还原“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中南海的场景。

#### （九）空军指挥所人员的回忆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在空军指挥所值班的作战参谋朱秉秀和指挥连副指导员张立法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回忆，特别是精确的时间节点。

朱秉秀在《邪不压正：“九·一三”事件纪实》（100）中说：9月13日“零点40分，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你们指挥所，需派人到门口接一下’。”朱秉秀提到了当夜在空军指挥所出现的空军领导人，还提到了当时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人，比如，9月13日早晨，“接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庆彤电话，是传达周恩来指示，说‘禁止飞行的命令，同样包含民航的国内外班机和其他飞行’。”

张立法在《“九·一三”，我在空军指挥所》（101）中说：本来零点该换班，但直到零点30分接班人员还没来。“后来才知道，空军司令部大楼和地下指挥所的警卫任务被陆军所代替，一切人员不准进，也不准出。”

笔者认为，张立法披露的信息值得研究人员深究：到底是谁指使陆军在零点之前就接管了空司大楼和地下指挥所的警卫任务？这意味着什么？笔者还认为，朱秉秀、张立法的回忆应该和李德生、陈先瑞的相关回忆结合起来分析。

另外，张立法回忆的“大约在凌晨一点30分，李德生在四位陆军人员的陪同下，从地铁来到了空军作战室”与朱秉秀回忆的指挥所副所长王级三在空司办公楼大门口接李德生，“随后李德生带警卫参谋进入指挥所”的时间和场景不符，何况坐地铁从人民大会堂到空司很不靠谱，笔者判断张文中的“地铁”乃“电梯”之误，因为李德生本人的回忆说的是：面受周恩来指示后，“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102）

#### （十）案中人的回忆

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1988年11月中旬对记者回忆了他亲历的林彪事件：庐山会议开幕前被林立果打过招呼，会议前期攻击过张春桥，后期遭到张春桥的反击；上海会议，即“三国四方会议”，与会者主要是闲扯，从头到尾无人提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更没有提到“571工程”，对于被林立果指定“负责杭州”，陈“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南巡到杭州，在专列上对陈和南萍、熊应堂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林副主席要保”这句话，引起了陈的注意：“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讲话有错误”；毛泽东离开杭州时，陈去送行，毛泽东、汪东兴对陈都很友好，“没有一点不正常”；“九·一三”事件一周后陈被王洪文诱捕，起初被关在南京，在逼供者的压力下，陈“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们一看就不相信”；后来陈被押到北京，纪登奎对他说：“鲁珉已经交代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吗？”陈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专案组没再纠缠陈同“571工程”和谋害毛泽东的事，只说他参加了“上海会议”的事。直到“两案”审理，也是如此，最终军事检察院决定对陈免于起诉。（103）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82年3月10日军事检察院对陈励耘免于起诉的决定书已经表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但汪东兴在其回忆录中仍然捕风捉影地描述了陈励耘1971年9月在杭州想谋害毛泽东的事。（104）

原空军干部处长张舜甫，文革前在乡下搞“四清”时就和叶群熟识了，在文革中调查过叶群的历史，还参加过林家的“选妃”活动，他回忆了叶群说文革怪话的一些实例，以及叶群精力充沛、敏感活泼，爱张罗、爱伸头、话多、会来事，不摆元帅夫人架子的一面。（105）

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说林立果“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还能鼓捣一通，他还异想天开，要搞科技方面的名堂，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一直认为他野心大得很。他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象。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有些事，在普通老百姓看起来可能是弄虚作假，在林立果的生活环境里可能习以为常。……那时候毛主席对江腾蛟有个批示：此人不可重用。可林立果就给江腾蛟一个条子，说是林彪写的：好好学习，养好身体。江腾蛟感激得不得了，说，拿什么去孝敬林副主席他老人家呢？想了半天把我养在他家的鸽子拿了两对送给林立果，让他转给林彪。林立果回答江说：首长很高兴，谢谢江政委。结果有一天我去曾国华家，一看，那两对鸽子在曾国华家呢。……所以我总想，林立果这个人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鲁珉还说周宇驰这个人很狂妄，“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周说，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他又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106）

由陈伯达儿子整理的《陈伯达遗稿》（107）收录了陈伯达暮年所写的“从九大到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记忆”等文字。这部分内容如果结合汪东兴、吴法宪等人的有关回忆来看，可以更好地还原庐山会议的场景。在《陈伯达遗稿》出版六年后，陈伯达儿子又整理了《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内中加入了陈伯达秘书和其他一些人的有关回忆，提供了关于庐山会议、所谓的“林陈联盟”更多的细节和解读，也澄清了一些误传。（108）

原空四军第二政委姬应五说，王维国原本与张春桥的私人关系很好，工作上也合作愉快，但在1970年春空军党委扩大会期间，黄永胜和汪东兴一起向王维国进行“路线交

底”，特别是汪东兴告诉王维国“张春桥是反军的”。从北京回来以后，王维国就与张春桥疏远了。（109）奇怪的是，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人，汪东兴肯定知道张春桥深受毛泽东信任，可他为什么这样对王维国说张春桥呢？

#### （十一）林立衡的叙述及其认可的林彪事件版本

香港刊登的《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110）披露了新版的林彪事件的林立衡叙述。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他南巡时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讲话，爸爸闻听后，终日惶恐不已。他曾含着泪对我说：我拥护毛拥护过头了……”关于“九·一三”事件，林立衡说：“事前，我知道林立果要挟持爸爸走。于是我通过警卫部队向周恩来做了四次报告，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这场悲剧发生。不知为什么，他们不但不命令警卫部队制止，反而通知要我也跟着上飞机走。这是为什么？我拒绝了。如若我真的跟了去，这段历史可能再也无法说清了。事件发生后，我又向中央做了如实交代。但几十万字的材料被他们窜改得变了味。”“当年审理‘九·一三’事件的那些专案组……至今还猖獗得很。不仅不让知情人说真话，而且到处抛售当年逼出来的‘档案’材料，任由人加水添料，随意发挥。真真假假愚弄读者……”林立衡还说：“专案组整人十分残酷。他们宁肯错杀一千，不会放走一人。动不动就用刑具惩治。冬天，把您放到冰窟里受冻；夏天，烧稻草给您加温。或让您戴着手铐睡觉；或系着头发让您整天站立；或不给您饭吃；或把您吊着‘包馄饨’。直到您招供为止。在北京，空军系统就有几千人被扫地出门，把您全家撵到外地的城镇或农村，搞得你家破人亡。有上吊的，跳楼的，撞墙的……这些年我东藏西躲，主要是怕被杀人灭口！这绝非耸人听闻。”

另外，《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一书提到林立衡1988年春天和罗点点见面时，谈了“九·一三”事件，她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她还说：她通过警卫部队报告中央后，中央却毫不做为，致使叶群、林立果坐车把林彪带走。（111）林立衡1998年和罗点点再次见面时，推荐了《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并说“我们觉得这本书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可以看”；还推荐了《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一文并说该文“对‘九·一三’事件的描述比较客观”。（112）

《我所知道的叶群》主要写了原空政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在毛家湾给叶群讲学时见闻，印证了张云生所写的一些内容，比如，“这些帮忙的‘学者’，大都由叶群直接调用，很少有机会与林彪见面。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叶群恨不得一夜之间吞为己有。但获得知识的过程，却不像滥用权力窃取物质财富那样容易。靠下命令不行，靠变相的‘打砸抢’也不行。于是，叶群就独创了一套‘捷径’，加紧为自己‘适应新形势’做准备。”（113）官伟勋也写了文革后林立衡向他谈的一些事情，比如叶群如何蒙骗林彪，此外，在叶群、林立衡的关系上，一边倒地偏向林立衡。不过，笔者觉得官伟勋对“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北戴河、毛家湾和空军领导机关三个现场情景的“报道”（114）有点价值。

《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115）一文结构散乱，东拉西扯，虽然讲了鲁珉经历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他被监禁时受到过非人的虐待，但却用较大篇幅给林立果在空军的前期作为评功摆好，并描述“九·一三”事件之夜林彪住地的场景。该文之所以能被林立衡推荐，显然是文中所说的9月12日深夜迷迷糊糊的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从床上拽起来骗走的。

笔者认为，张宁的《尘劫》和《自己写自己》（116）中的有关内容，即“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架住毫无生气的软绵绵的林

彪”上了汽车（117），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九·一三”事件的林立衡式叙述。实际上，张宁1993年在纽约接受汉纳姆采访时就说过林立果和叶群一起把吃了安眠药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拖上汽车冲向山海关机场。（118）《自己写自己》爆出的新料有两条：李文普左臂上的枪伤经张青霖（张清林）检验是自伤，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刘吉纯）会同8341姜队长（姜作寿）等人再次验伤，确认张青霖的诊断：“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后，李文普在与纪登奎做了笔交易后揭发“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119）

## （十二）对林彪事件的林立衡式叙述的反驳

为了反驳林彪事件的林立衡式叙述，原空军清查办的一些人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披露了一些史料。

刘世昌、袁正元、高德明和宁焕星联名发表的《〈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一文有不实之处》（120）指出：“人证、物证确凿说明‘九·一三’事件的主谋和总后台。没有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和叶群谁也指挥不了谁。”为了否认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胁迫’出走的说法，该文披露了“三个重要材料”：“一是当年林立衡写的《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二是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写的材料”，“三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的回忆材料”。

不过，该文并没有披露这三个材料的撰写日期。而据笔者目力所及，这三个材料邵一海以前就披露过，所以也就无甚新奇之处，虽然该文提到李文普1996年3月再次向高德明肯定他所写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该文也有不实之处，比如，林彪1969年9月亲自指示吴法宪安排林立果出任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这个说法来自吴法宪的伪供。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121）则反驳张宁的《自己写自己》以及张宁背后的林立衡。李文普说9月12日夜里叶群去叫林彪走时，林彪是清醒的，并对李文普说了“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还说林彪是自己走进汽车的，在车上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李文普明确否认开枪自伤，否认张清林给他包扎和验伤，否认刘吉纯在场。

不过，李文普没有回应张宁说他“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这个揭发是“九·一三”事件半年后的事情。另外，李文普说“只是在近几年林立衡才私下对人散布说‘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也不够客观，毕竟姜作寿、刘吉纯、宋德金当年就怀疑他自伤，并且散布过、汇报过他们的怀疑。

高厚良1973年5月出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就兼管了对林彪集团案的清查揭批工作。他的《“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122）主要针对《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而述，他披露：“‘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高厚良坚称空军的帮助小组没有迫害过林立衡，但也承认林立衡当时就对帮助小组的做法很不满，并为此给他写过两次信，还有过一次“自杀”。高厚良还声称：“林彪的案子……铁证如山，想翻案是翻不了的。林豆豆的许多假话本来不值得过于重视，一一批驳。只是有些报刊还在随意炒作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有些人又以假为真，人云亦云。所以才不得不把林立衡的若干材料，都公之于众。……倘有必要，我还有一些材料可以在适当时候公布。”

笔者认为，高文中最大的看点是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霖对林立衡的评论，以及林小霖的一些调查和说法，比如，林小霖对李文普的访谈；又比如，谢静宜1988年曾经对她调查的林小霖说：“当时中央主持清查林彪案件的是周恩来总理，怎么可能逼林立衡揭发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我当时奉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的指示，去玉泉山与林立衡保持联系。她写的材料全部密封送交周总理，我不看，更不敢篡改。……政法机关对笔迹是可以鉴定的，林立衡的字与我不同，她亲笔写的东西都在中央档案馆，怎么能说是我搞逼供信改的呢？”

注释：

- 78、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战略与管理》，2013年1/2期合集。
- 79、《林彪秘辛大公开》，《亚洲周刊》，1994年2月6日，页52—57。
- 80、李安定：《一个西方记者采访林彪之死真相的旅行》，《视点》，1994年6月8日，页42—46。
- 81、蒋健：《历史不忍细究——揭开“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记忆》119期，2014年9月30日。
- 82、敖其尔：《今日温都尔汗》，《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第1版。
- 83、岚叟：《卫队长记忆中的“九·一三”前夜》，《中华儿女》，1994年5期，页28—36。
- 8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85、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67—2002。
- 86、《周恩来传》，页1995。
- 87、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1期，页27。
-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0。
- 89、丁凯文、司马清扬：《找寻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557。
- 90、靳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时代的报告》，1980年4期，页5。
- 91、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页115；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页75—76。
- 92、《周恩来传》，页1992。
- 93、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234—243。
- 94、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76—85。
- 95、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页170；《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版》，2013，页125。
- 96、高振普：《“九·一三事件”50小时内的周恩来》，《炎黄春秋》，1998年1期，页8—11；《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中华儿女》，2000年4期，页9—13；《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19—130。
- 97、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1—174，页286；《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页199—214。

- 98、董保存：《我为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同志访谈录》，《党史博览》，1994年1期，26—27页；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页513—518；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29—130；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页168—174。
- 99、笔者注：周福明把“9月12日晚上”误说成“9月13日晚上”了。
- 100、朱秉秀：《邪不压正：“九·一三”事件纪实》，《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6期，页24—26。
- 101、张立法：《“九·一三”，我在空军指挥所》，《党史博览》，1999年12期，页47—48。
- 102、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11期，页10。
- 103、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引自司任主编的《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页402—419。
- 10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184—190。
- 105、张聂尔：《叶群其人》，《八小时以外》，1997年5期，页77—78。
- 106、张聂尔：《有关林立果》，《八小时以外》，1997年6期，页74—76。
- 107、《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1998；《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 108、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372—424。
- 109、张聂尔：《风云“九·一三”》，页218—219。
- 110、李衡：《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天安门》，1998年8月号。
- 111、罗点点：《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广州，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283—286。
- 112、《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页290—291。
- 113、《毛家湾纪实》，页370。
- 114、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228—244。
- 115、史小力：《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炎黄春秋》，1998年1期，页12—18。
- 116、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自己写自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 117、《自己写自己》，页249—250。
- 118、李安定：《一个西方记者采访林彪之死真相的旅行》，《视点》，1994年6月8日，页44—45。
- 119、《自己写自己》，页252，页295。
- 120、刘世昌、袁正元、高德明、宁焕星：《〈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一文有不实之处》，《炎黄春秋》，1998年10期，页64—68。
- 121、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期。
- 122、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中华儿女》，2000年9期，页4—11。

（未完待续）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启之主编，2019年11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